

<<别样的色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别样的色彩>>

13位ISBN编号：9787208078727

10位ISBN编号：7208078726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页数：487

字数：363000

译者：宗笑飞,林边水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别样的色彩>>

内容概要

一些帕慕克自称“小说无法表达”的想法、影像和片断，成就这部《别样的色彩》，他的第一部“碎片式组合集”。

一部通过记忆、遐想、素描、访谈与旅行，展现作者多个自我的优美篇章。向我们透露出更多你不了解的帕慕克。

帕慕克回忆了他拥有的第一本护照、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女儿如梦的小时候，还讲到自己父亲的过世，谈及他不久前的官司，以及他所亲历的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

还写到了几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作家，如劳伦斯·斯特恩、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科夫，以及略萨……当然，少不了伊斯坦布尔和纽约，那是他所有作品成形的地方。

伊斯坦布尔是他的起点与归宿，而他在纽约生活过两年。

一部帕慕克三十年创作生涯的个人精选集，展现出独特视角下，作者倾其一生对孤独、满足、书籍与城市的执迷。

<<别样的色彩>>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 ），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

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

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总计已被译为50多种语言。

帕慕克中文网站：www.orhanpamuk.cn

其他作品：

《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雪》《黑书》《新人生》《寂静的房子》《杰夫代特先生》《纯真博物馆》

<<别样的色彩>>

书籍目录

- 生活及忧虑 01 隐含作者 02 我的父亲 03 1994年4月29日笔记 04 春日午后 05
 夜晚疲惫至极 06 在夜的静寂中起床 07 家具们在聊天，你如何入眠？
 08 戒烟 09 雨中的海鸥 10 海滨垂死的海鸥 11 快乐 12 我的手表 13
 我不想去上学了 14 如梦和我们 15 当如梦难过时 16 风景 17 关于狗，据我所知
 18 诗的正义笔记 19 暴风雨之后 20 很久以前在这个地方 21 孤独男人的房子
 22 理发师 23 火灾与废墟 24 法兰克福香肠 25 博斯普鲁斯渡船 26 海岛
 27 地震 28 伊斯坦布尔的地震恐惧 书与阅读 29 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 30 论读
 书：词语或意象 31 读书的快乐 32 关于图书封面的九条说明 33 读还是不读：《一千
 零一夜》 34 《项狄传》序：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位这样的叔叔 35 维克多·雨果对伟大的酷
 爱 3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堕落的快乐 3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恶魔
 38 《卡拉马佐夫兄弟》 39 残酷、美丽和时间：论纳博科夫的《阿达》和《洛丽塔》 40
 阿尔贝·加缪 41 在不幸时读托马斯·伯恩哈德 42 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
 43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第三世界文学 44 萨尔曼·拉什迪：《撒旦诗篇》
 与作家的自由 政治、欧洲以及保持自我本色的其他问题 45 阿瑟·米勒国际笔会讲演词 46
 禁止入内 47 欧洲在哪里？
 48 怎样做地中海人 49 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 50 安德烈·纪德 51
 宗教节日时的家庭用餐和政治 52 受辱者的愤怒 53 交通和宗教 54 在卡尔斯和法兰克
 福 55 受审 56 你为谁写作？
 书如人生 57 《白色城堡》之后 58 《黑书》：十年以来 59 《新人生》采访节选
 60 《我的名字叫红》采访节选 61 关于《我的名字叫红》 62 卡尔斯笔记中的雪（节选
 ） 画与文 63 席琳的惊讶 64 森林与世界一样古老 65 无名杀手之谋杀与侦探小说
 66 幕间休息；或，啊哈，埃及艳后！
 67 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名建筑师？
 68 塞利米耶清真寺 69 贝利尼和东方 70 黑笔 71 含义 别样城市，别样文化
 72 我第一次和美国人打交道 73 世界之都观光记 《巴黎评论》采访 凝望窗外 我父亲的手提箱

<<别样的色彩>>

章节摘录

49 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 1959年我七岁时，父亲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得到消息说他到了巴黎。他住在蒙帕纳斯一家便宜的旅馆里，正忙着在他的笔记本上涂写东西。后来，在生命将尽之时，他把这些笔记本装在手提箱里，留给了我。那时候，父亲坐在多摩咖啡馆（The Café Dome）里时，常常可以看到让 - 保罗·萨特从外面的街道经过。我祖母习惯于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钱。我祖父是个商人，他靠铁路行当挣了很多钱。在祖母令人心烦的眼光看管下，父亲和他的叔伯们才没把所有的遗产耗个精光，才没把所有的房子卖掉。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后，宣布钱已经用完，也不再给巴黎的波希米亚儿子寄钱。这样，我父亲也加入到一个世纪以来流浪在巴黎街头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大军中。他们每个人都身无分文，悲惨可怜。像我的祖父和叔伯们一样，父亲也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很有数学天分。钱花完以后，他就应聘报纸上的广告；他被IBM公司雇用过，还曾被派往日内瓦的办事处。那时，计算机还要靠打孔卡来运作，大众对计算机所知甚少。就这样，我的波希米亚作家父亲成了欧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不久后，母亲去和父亲会合了。她把我们留在祖母那豪华、拥挤的家里，自己坐飞机去了日内瓦。哥哥和我则要一直等到夏天学校放假才能去。而且，我们两人必须拿到护照。我记得，为了照护照照片，我们得长时间地保持姿势，任由摄影师支起三脚架，在带有压气皮腔的木质装置后面盖一块黑布，然后在后面不停地捣弄。为了让光线照在化学处理过的玻璃感光板上，他会突然优雅地抖动手腕，瞬间把镜头打开。但是，在此之前，他会先看看我们，然后说：“噢……”我觉得这个老摄影师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张护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紧咬着嘴巴的歪脸形象。在这张照片上，我的头发是栗褐色的。那时，我常年都不去梳理它，为了这张护照照片才算破了个例。我当时翻看护照时，一定非常匆忙，竟然都没发现弄错了我眼睛的颜色，这个错误，我是在三十年后打开这本护照时才发现的。这件事情告诉我，护照并不是我们真实身份的证明，它只说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这与我以前的想法恰好相反。我和哥哥把新护照揣在夹克口袋里，乘飞机来到日内瓦，两人都心怀恐惧。飞机在降落时，开始倾斜着飞行。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个叫瑞士的国家此时成了一个奇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包括云层，都立在悬崖之上，斜斜地向无限延伸。飞机转弯结束后，机身才正了过来。我们终于弄明白，这个新国家也和伊斯坦布尔一样建立在平坦的大地上，这才如释重负。现在，每当我和哥哥回想起这一幕时，还忍不住大笑一阵。这个新国家的街道比我们那里干净，宽敞。商店橱窗里的商品种类繁多。路上的车辆也更多些。这里的乞丐，不像伊斯坦布尔的乞丐那样空着手乞讨，他们会站在窗子下面拉手风琴。在我们把钱扔给他们哪个人之前，母亲会把钱用纸包好。我们那“配备家具”的公寓，离罗纳河上的几座大桥步行有五分钟的路程。

<<别样的色彩>>

罗纳河正是在这里注入日内瓦湖。

于是，我开始把异国生活想像成这个样子：你在桌旁坐下，但那是以前别人坐过的地方；你使用的杯子、盘子，也是别人吃饭用过的；你睡的床松弛而下陷，这是多年为其他睡觉的人充当摇篮的结果。

异国，就意味着是属于别人的国家。

当时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在使用的那些东西，永远不会属于我们。

而这个古老的国家、这片异土，也永远不会属于我们。

我母亲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所法语学校学习过，她让我们兄弟俩每天上午都坐在餐厅的空桌子旁边，努力教我们学法语，整个夏季都是如此。

直到进入一所国立小学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先前简直什么都没学。

父母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我们通过日复一日听老师讲课，就可以学会法语。

课间休息时，哥哥和我会在嬉戏的孩子群中互相找寻，直到我们看到彼此，并紧紧抓住对方的手。

这片异土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到处是愉快玩耍的小孩。

哥哥和我只能带着渴求，从远处观望着这个乐园。

我哥哥虽然不懂法语，但他每隔三个数字倒着数数的本事，却是整个班上最好的。

而我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学校里，惟一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我的沉默。

后来，我拒绝再去上学，就像人们渴望拒绝做那种没有人说话的梦一样。

于是，当我们被带到各个城市、各种学校后，我开始变得内向，这倒是可以保护我免受生活的煎熬，当然它同时也剥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

终于，有个周末，父母让哥哥也退了学。

他们把护照塞到我们手中，让我们离开了日内瓦，回到伊斯坦布尔的祖母那里去了。

我再也没用过这本护照，即便那上面写着“欧委会成员国”的字样。

它成了我第一次欧洲冒险失败的纪念品。

我回国的决心非常坚定。

等我再次离开土耳其时，又一个二十四年过去了。

我年少时对那些有护照、能去欧洲以及更远处旅行的人，总是充满了崇拜和向往。

但尽管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国，我却始终坚信，我的命运应该就是坐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角落里，一心一意把自己交给书本。

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些书能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某些书则可以让我成名。

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对欧洲最伟大的作品进行深思，来更好地了解欧洲。

最终，是我自己的书促使我申请了第二本护照。

我多年来闭门不出，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位作家。

现在，有人邀请我去土耳其人的政治避难所——德国作巡回演讲。

据说，有些人很喜欢听我朗诵自己那些还未译成德语的作品。

我申请护照时，曾带着幸福的希望，以为自己可以认识德国的土耳其裔读者。

但也正是这些旅途，使我开始由身份证件联想到了身份危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危机还会让很多其他人饱受折磨。

这里，我很想讲一个关于身份的故事。

那是1980年代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我又坐在那些总是在梦中出现、出奇准时的德国火车上。

火车从一座城市飞速开往另一座城市，一路上经过黑暗的森林、远处村庄里教堂的钟楼，还有站台上陷入沉思的旅客。

每到终点站时，我的土耳其主人都会来接我。

不论有任何的不足之处，哪怕是我没有注意到的，他都会向我道歉。

带我去城市观光时，他会告诉我，某某某有望出席晚上的活动。

我很喜欢回想朗诵的情景：参加者有政治避难者及其家人、教师、半德国血统半土耳其血统的年轻人。

这些人希望多了解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生活。

<<别样的色彩>>

每一次聚会的参加者，还会有几个土耳其工人和德国人。

后者认为，对土耳其的东西产生浓厚兴趣总是好事。

在每个城市的每一次朗诵，其情景都如出一辙。

我朗诵完自己的作品后，总会有某个愤怒的青年举起手来，示意要发言。

随后，他就开始对我大加嘲讽，说我竟敢写些空洞的书，谈论抽象美，而土耳其却仍然处于压迫和苦难之中。

我虽然对这些苛刻的言辞予以反驳，但是，那些话还是激起了我心里的负罪感。

在愤怒的青年之后发言的，一般会是一位女性，她有着强烈的愿望想要为我辩护，并激动地浑身发抖。

她的提问，多半和我作品中的对称，或者一些其他类似的精巧之处有关。

接下来是一些宽泛的问题，主要问及我对土耳其、政治、将来，还有人生意义所抱的希望。

我就像一位年轻热切的作家该做的那样，回答了这些问题。

有时候，有人会借此大做一些充满政治术语的讲演，当然其目的不是要非难我，而是针对听众中的某些人和事。

而后，邀请我来赴会的社团领导人还会告诉我，某某演讲者来自哪个左翼派别。

他们还会进一步跟我解释，演讲者希望那些小分裂组织的成员从他的发言里获取怎样的意义。

很多年轻人要求与我分享我成功的秘密，从他们那兴奋的程度，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国内的人相比，并不把追求生活的雄心壮志当做什么可耻的事。

然后，有人突然会问：“你怎么看德国的土耳其人？”

“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他们破碎的梦想。

有人还会问：“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爱？”

“这类问题则牵涉了我的梦想。

这时，大厅里的八九十个人有的开始微笑，有的开始嗤嗤窃笑，于是我知道，听我说话的这群人彼此都认识，即使不能算关系亲密，那他们至少也知道对方。

当朗诵会在温暖、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时，一位年长的先生会对我大加赞美，然后就向一位半土耳其半德国血统的青年投去警告的目光，此人在后排和不少类似青年在大声傻笑。

这位老先生可能是位快要退休的老师，为这些青年的利益着想，他接着骄傲但却令人失望地作了一个民族主义讲演。

主要是讲土耳其——他们的祖国——有些如何如何优秀的作家，以及为什么通过读这些作家来了解祖国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先生的美妙言辞，却越发让这些青年们大笑不止。

可见，这些关于身份的谈话以及关于民族性的无休止的问题，只不过增添了一种家庭气氛而已。

朗诵结束之后，组织者往往会带我和另外十到十五个人出去用餐。

一般都是去土耳其餐馆。

就算不是在土耳其餐馆，我在桌上被问的那些问题、其他人之间说起的笑话，以及他们提到的话题，也很快就会给我一种印象：我仍然在土耳其。

其实，我谈论文学的兴趣，远比谈论土耳其要大，所以我觉得很沮丧。

后来我还认识到，即使我们表面上在谈论文学，但我们真正在讨论的，似乎还是土耳其。

文学、书籍、小说都只是借口而已，借此可以谈论，或者逃避令人烦扰的不确定自我，而这种自我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沉重不幸的来源。

在这些以及后来的所有旅程中，我常常观察那些来听我朗诵的人。

那时，我的作品已在德国出名。

在他们脸上，我似乎永远能看到一种心不在焉，他们总是对土耳其性和德国性这类问题更感兴趣。

因为我的作品有部分内容涉及东西方的矛盾，因为我这个作家探讨了东西方矛盾造成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所以，我的听众们（那些被寓言性的文学游戏弄得不能正常思考的人）认为，我一定和他们一样为身份问题所困惑，对黑暗面很有兴趣，而实际上我并不是这样。

他们会花上一小时引导我对那些问题畅所欲言，然后悄悄地退到土耳其裔德国人的秘密角落里，开始

<<别样的色彩>>

无休止地争论在何种程度上他们算是德国人或者土耳其人。而我仅仅是一个土耳其人，不是土耳其裔德国人，所以我开始感到了孤独。我以自己的方式觉察到，这屋里给人一种不幸福感。

这是不幸吗，或者说它是宝贵财富的来源吗？

我无法断定。

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充满热情，多么真诚；不管这些人如何解释那些引起我们焦虑的梦想和恐惧。这种谈话总让我感到绝望，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现在，让我用最喜欢的等级表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坐在那些桌子旁边，听着别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而夜晚则在慢慢地流逝。

但我注意到，他们对土耳其性和德国性的程度，在判断上有量的差别，我同桌的土耳其裔德国人要求我承认这种差别。

在这些不同程度的差别里，有些人认为完全变成德国人很重要。

当然，这是说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

这种人对有关土耳其的一切记忆，都采取回避态度，有时甚至还称自己为德国人。

我们不妨给这些人赋值为 10。

而对那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愿意淡化其土耳其性的人，我们给其赋值为 1。

这类人虽然生活在德国，却以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为自豪。

桌边还坐着一些人，介于两个极端之间。

他们又分为好几类。

有些人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要回到土耳其，但是在度假时，他们却会选择去意大利。

有些人拒绝在斋月进行斋戒，但每天晚上仍然看土耳其的电视节目。

还有少数人，即便对德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情绪，却依然与土耳其人朋友越来越疏远。

对这些人所作的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发过的誓言稍加思考，这些选择底下隐藏的东西便会昭然若揭：害怕受人羞辱，未曾满足的欲望、痛苦，还有孤独。

但是，最让我吃惊的，是那种绝对和狂热的信念。

有了它，任何人都可以捍卫自己所属等级的正当性，而摒弃其他的等级。

正是这种绝对和狂热的信念让我觉得，不管坐在桌旁的那些人在我的等级表上处于哪个位置，自己似乎总是在观看神秘的同一幕反复上演。

因此，对于一个在等级表上赋值为 5 的人来说，如果他认为，他的惟一道路就是既做德国人又做土耳其人的话，那还不够充分。

他应该追击所有那些赋值为 4、思想封闭、落后的人，还有所有那些与自己的真实身份切断了联系、赋值为 7 或 8 的人。

夜已深了。

可是这些人还不满足于仅仅将与自己对应的土耳其性和德国性抬升至最佳程度，他们还用火热的腔调宣布，自己的土耳其性和德国性是一种信仰，它无比神圣，不容置疑。

这让我想到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名句，大意是，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民族主义者以及对身份执迷追求的人。

幸福的民族主义者常常要表达对国旗的热爱，或者庆祝本国在足球比赛和国际竞赛中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主义者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但是，当国别差异不是庆祝的理由时，民族主义就会出现可怕的变种。

我们的护照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他们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喜悦，有时则会带来痛苦。

至于护照引起我们身份质疑的种种惨痛，任何两人都不会有相同的经历。

1959年，我和哥哥站在日内瓦一所学校的操场里，手拉着手，隔着一大段距离，羡慕地观看其他的小孩在嬉闹，玩耍。

后来，我们带着自己的护照，被送回了土耳其。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千上万的小孩来到德国定居，有人有护照，有人没护照。

<<别样的色彩>>

这些人，都注定要陷入一种更深沉的绝望。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距今已经过去了十或十五年。

现在，这些人试图用德国护照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们几乎可以肯定自己都能获准得到护照。

也许知道护照可以减轻悲痛，是件好事，哪怕只能减少一点，都是好事。

这护照是一种证明，记录了别人对我们的成见和判断。

但是我们的护照都一样，不会让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每个个体都为自己的身份、欲望和悲痛所困扰。

22理发师 1826年，奥斯曼军队在西方人面前遭受了一连串惨败，过去一直作为帝国军队的近卫军，反对按照欧洲标准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

这之后，国家的改革者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派遣他的新军攻打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总部，并将其夷为平地。

这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帝国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时刻。

从那时起，土耳其所有公立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被教导，要效法西方现代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

这被称为“利好运动”。

在这利好运动中，鲜为人知的是，市中心有上万近卫军卷入了这场冲突，大屠杀充斥街巷、店铺，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面貌，其痕迹至今仍随处可见。

无可否认，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讲述的，确有其真实的一面。

在过去的四百五十年里，绝大多数身居要位的近卫军都隶属于苏菲教派的比克塔西教派，他们与城中大部分商铺主关系密切。

那时近卫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全副武装在街上巡逻，扮演今天的警察和宪兵的角色，控制着各类店铺。

他们气势汹汹地出现在街头巷尾，与国家改革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对峙。

于是，马哈茂德二世首先将他的军队派至各个咖啡馆、理发店，其店主大部分都与近卫军过从甚密。

为了保护军事胜利的成果，他下令关闭了所有咖啡馆和理发店。

（其做法正如同许多苏丹一样，特别是穆拉德四世 [Murad IV]。）

据说后者至今仍乔装改扮，为了镇压街巷中的反叛者，夜间在城市街头逡巡。

）这里，我想把这种做法与我生活的时代做个平行比较：新共和国也同样偏爱关闭报社。

直至不久以前，城市中的咖啡馆、理发店，（还有我童年时代常见的共乘出租车——多姆小巴，）仍然是各类消息、传闻、流言飞语、彻头彻尾的谎言、怒火中烧的传言，以及反政府情绪滋生、蔓延的地方，以此来抵制宗教领袖和政府的宣传口号，为密谋反抗政府铺平道路。

同时，清真寺、教堂、市场，以及博斯普鲁斯沿岸村落的周边地区也同样会散播各种消息，起到了地方报纸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伊斯坦布尔涌现出了许多幽默杂志，这其中就有最为著名的《秃鹰》（Vulture）。

它们对城市的光怪陆离过分藻饰、夸张，极大地传达了那种反抗情绪。

因此，我童年时代，它们在所有理发店里都极受欢迎。

如今，总有电视台爱大声喧嚣，淹没了以前的那些信息渠道，并削弱了弥漫于城市咖啡馆、理发店等处的各种传言和抵制情绪的威力。

毋庸惊奇，随着电视的发明，伊斯坦布尔幽默杂志的黄金时代已经迎来了它的末日，而其销量曾经几近百万。

（很多年后，我走进纽约的理发店，看到等待理发的人们，手中拿的并非幽默杂志，而是人手一册《花花公子》[Playboy]，我并未感到有多么惊讶。

）而《秃鹰》，曾是我童年时代每家理发店都有的杂志。

后来人们才知道，它的所有者优素福·兹亚·奥尔塔克（Yusuf Ziya Orta.）曾接受过一项私人基金的秘密援助。

这基金属于民主党领袖阿德南·曼德列斯总理（Adnan Menderes）。

<<别样的色彩>>

这类做法始于 1870 年代，那时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Abd ü lhamit）为控制反对人士，将其出版物全部收购。

这个传统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延续至今。

孩提时代，在理发馆等待理发时，我总是爱随手翻看《秃鹰》杂志，时不时研究一下那些国内漫画。那上面的小市民们望着商品的价签目瞪口呆。

有时，我会开心地读着讽刺某些老板和秘书的笑话，或是一些小故事。

故事多出自深受欢迎的幽默作家阿齐兹·内森（Aziz Nesin）之手；还有那些从西方杂志上摘录的卡通画。

此外，我的耳朵还一面留心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

当然，讨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足球比赛和赌球。

有些人，例如头号理发师图托，总是喜欢一面穿梭于三个顾客的椅间，一面宣扬他对拳击和赛马的看法，有时他会去玩这些玩意儿。

他的理发店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维纳斯，坐落在一条小巷尽头。

小巷就位于我们在尼尚塔石的家所在的那条街对面。

图托是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白头发的阴郁男子。

理发店还有两个更为年长的店主。

一个是秃头，人很急躁。

另一个看上去四十来岁，留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稀疏胡须。

我记得，他不大愿意和顾客们聊物价上涨，附近开了哪些商店，时下流行的歌星、影星或是国内民主政治等一类话题，倒是更乐意谈谈国际事件和世界形势。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有些地位显赫、内行、有权势的上等人光顾时，这几个理发师总会用谦卑的口吻问，“当然，我们不知道……”而一旦他们令其开口说话了，就会迅速将话题转到这些人的专业领域和强项上来。

如果能够得到诸如“这值多少多少里拉”或是“那艘货轮比足球场还大”之类的答案，如果这些人告诉他们，某个著名政界要人其实权势微弱或是有过懦弱之举，理发师们要么就会像小鸟那样，嘴里发出类似“呃 - 呃 - 呃”或“咯 - 咯 - 咯”的嘀咕声，要么就会突然暂停正挨着皮肤、光滑前行的剃刀，这时理发师和顾客就会在镜子里盯着彼此，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有趣的沉默。

之后，理发师试图再次打开话匣子。

他们会问，“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了？”

或是“事情进展如何？”

再就是“来杯茶怎么样？”

，而如果在之后，客人们还是神情严肃，一声不吭的话，理发师们就会彼此闲聊起来。

他们在谈话里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一个是时运不济的倒霉蛋，另一个是受人讥讽的大活宝，第三个则最狡猾。

他们喜爱彼此讽刺。

例如，“马哈迈特这周又骗了图托一把”，那口气使我想起曾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某个传统皮影戏节目，主人公卡拉古兹和他那牙尖嘴利的妻子哈丝瓦特之间就有类似的争吵。

客人刮完脸后，脱下护裙，一个男孩子给他梳了梳头发。

客人递过来一些小费，随即离开了理发店。

前脚刚走，那个费尔班克斯胡须，刚刚还极其谦卑、顺从的人，这会儿就立刻开始咒骂起这位顾客的母亲和妻子来了：如此我发现，成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狡诈虚伪，他们的愤怒总是埋藏得比我们儿童要深得多。

我幼年时代的理发馆，理发师们大多使用剪刀，大剪刀不太好使时，他们总会愤怒地将其扔到一边。

此外，还有梳子、棉扑（用来清扫碎头屑，以防它进到眼睛里）、古龙水、扑粉，还有为成人准备的直剃刀，以及刮胡膏、刮胡刷、白围裙等。

而如今，除了一些电器设备——像吹风机——其他没有多大变化。

这也提醒我们，即使伊斯坦布尔的作家从不提及他们的传统，这些理发师们一直以来，也是以同样的

<<别样的色彩>>

方式讲述着这些传统。

数个世纪以来，他们都使用着相同的工具，边理发边闲聊。

我们从细密画中能看出那剃刀的年代，那把直剃刀是17世纪就在使用的那种。

那时，在经过艾哈迈特苏丹（Ahmet）面前时，理发行业的代表为了证明他们的技艺，会把一名理发师倒挂在展示车顶，而他依然能够娴熟完美地为客人刮脸。

在那个年代，等待刮脸的客人，他的头会倚在理发师的膝盖上。

这一习俗为传统的爱情故事大开方便之门。

一个男子，渴望理掉他所有的头发、髭须和鬓角，仅仅是为了靠近那个漂亮的理发师学徒。

我们也能在民间故事凯瑞姆和阿斯丽（Kerem and Asl.）中，看到相同的主题。

陷入爱情中的人不惜拔掉自己的牙齿，只是为了亲近那漂亮的牙医。

这也暗示着，理发师和牙医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其技艺也有交叠之处。

理发师还做包皮环切之类的小型外科手术。

有些手术在咖啡馆中进行，还有一些则是在专门场所完成。

这些都使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社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孩提时代，我最害怕理发师的，是他们就像牙医拔牙一样，能够如此技巧娴熟地从我们嘴里套出话来，并像报纸一样，将这些话迅速散播开来。

正是这样，当我坐在维纳斯理发店读着《秃鹰》时，如果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过来吧，年轻人”，我就会紧张得好像有人叫我坐在牙医的椅子上。

这不仅是因为，给我收拾头发的人常常把碎头屑弄到我的脖子里，剪子也总会戳到我（我对理发店的光顾似乎总是伴随着疼痛）。

我害怕，更是因为担心会泄露家族的某些秘密。

我有一个叔叔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

理发师们将白色的理发围裙绕过我的头围好，并牢牢系紧，就像对待一个即将被实施绞刑的人。

或许，他们随后要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叔叔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呀？”

“我不知道。”

“他离开多少年了？”

“他已经走了很……久。”

“另一个理发师会回答道，“再也不会回来了，不，永远不会来了。”

他真的曾服过兵役吗？”

之后，是一片沉默。

我会直直地盯着眼前，就好像我是那个在服兵役前“逃离”了祖国的人。

我记得，祖母曾用哽咽断续的土耳其语，哭着读叔叔少得可怜的信。

但我真正担心的，是理发师会套出我的其他秘密，那些我的家庭成功隐瞒了的，而我也不愿再记起的秘密。

我第一次面对理发师时，曾经泪流满面。

是否因为当时我已经预见到了这些危险？

还是说因为进理发店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自己会像今天这样大汗淋漓，仿佛对面坐着一位对我私人生活极感兴趣的记者？

后来几次，我生病想理发的时候，图托，这个白头发的，面无表情的理发店主，就会把他理发的家伙塞到包里，上门来为我服务。

他把报纸在桌上铺开，上面放个凳子，然后让我坐下。

这样，我就可以和他的剪子保持一致高度。

这个阴郁的男人抛开他那些喋喋不休的朋友，默默地待在这里。

但或许我也和他一样，不大喜欢这样的间歇期。

所以没多久，我又开始去他的理发店了。

那时我相信了，一个理发师如果可以一言不发地给你刮脸，无法让你开口蹦出一言两语，不愿和你分享家长里短或是某些政治八卦，那他就根本不是个理发师。

<<别样的色彩>>

.....

<<别样的色彩>>

媒体关注与评论

真是才华横溢……这些伊斯坦布尔散文的力量源泉和（帕慕克）的小说同出一辙，其喜剧性的源泉亦是如此。

——《纽约时报》 非常具有想像力……笔调轻盈却又令人心碎……与米兰·昆德拉不同，面对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还有当土耳其人的沉重感），（帕慕克）将其轻盈欲飞的笔调发挥得淋漓尽致。

——《洛杉矶时报》 他的描述与威胁和引诱等对峙力量相脉动……帕慕克光辉四射。

——《金融时报》 微妙、精巧、妙至毫巅……这些文章有很多是印象式的素描或小品文，是一个敏感的作家对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快乐和痛苦做出的反应。

——旧金山纪事报 帕慕克透露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虽然他的本意可能不想说这么多……（他）在写作生涯的鼎盛时期，让我们深刻地了解他如何看待他自己，他愿意别人去了解他。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它对于艺术家的刻画，足以摄人心魄：这位艺术家的经历和深刻见解对我们来说都是奇谈怪论，但对当下的问题却又一举击中肯綮。

这是一本非常出色、可读性极佳的书，作者不愧是位伟大而令人难以抗拒的作家。

——《芝加哥太阳时报》 （这些文章）引人入胜地展现了他心目中的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特性，而后者正是他的小说和文学观的源泉。

——《丹佛邮报》 富有人情，美丽迷人……（帕慕克）已经成为伟大、不朽的作家，东方和西方都可以满怀感激地将他当成自己的作家。

——《纽约时报》

<<别样的色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